

【学术动态】

# 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产业发展与制度 创新思考

——2009《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黄中伟, 孙伯良, 董富华

(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在2009《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产业发展、宏观经济形势与产业发展环境、产业制度创新和中国产业发展、产业微观机制与企业转型升级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综合与会者观点,中心观点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金融制度的缺陷,但根源在于产业发展机制障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见底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弱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正是时机;中国经济关乎世界经济发展走向,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修复,形成有利竞争格局;产业发展重在机制和制度创新;修复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结构破坏,要立足于产业微观机制,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产业发展; 产业制度创新; 企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09-0137-08

2009年8月22日至23日,“中国产业发展论坛2009《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大会收到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100多篇,70余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分为著名学者专题报告和与会青年学者分组讨论两个部分。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就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产业发展、宏观经济形势与产业发展环境、产业制度创新和中国产业发展、产业微观机制与企业转型升级等论题,展开了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平研究员,浙江财经学院院长王俊豪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孙伯良教授,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李刚博士、陈伟光博士、李永强博士分别主持了第一、二、三分会场青年学者的学术讨论,郁培丽博士和杨永忠博士、白让让博士和唐家要博士、黄中伟博士和唐跃军博士分别对一、二、三分会场青年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考察了浙江梦娜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新光控股集团。现将与会青年学者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收稿日期】** 2009-08-26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复杂网络演化的产业组织N-SCP分析范式与建模研究”(批准号Y6080232)。

**【作者简介】** 黄中伟(1969—),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孙伯良(1956—),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董富华(1968—),男,浙江常山人,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产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就“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做了主题报告。他从分析此次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回顾和思考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思维和发展历程。他指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金融制度的缺陷,但更多源于产业发展层面的矛盾和问题:①依赖石化能源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进入巅峰时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压力。②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面临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缺乏有效的成本弹性消化机制。③高科技产业兼有巨大的创造性和破坏性。在缺乏有效、新的商业模式情况下,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不足,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④金融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自我增殖能力,在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缺乏投资空间和投资信心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自我膨胀,存在泡沫压力。

那么,世界产业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呢?金碚研究员认为,问题出在世界产业发展机制存在障碍:①创新机制不强障碍。产业创新技术路线不明,看不到突破性创新前景,外部创新压力无法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动力,导致产业技术创新不足。②产业机制弹性障碍。产业机制缺乏弹性,企业成本控制能力衰减。企业盈利高度依赖于虚拟经济和资本运作,联动信用危机压力增大。③市场机制渗透障碍。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缺乏市场渗透力和扩张力,高度依赖于信贷扩张寻求市场和刺激消费,虚拟财富膨胀。

金碚研究员预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带来三个方面的经济大调整:一是金融体制的大改革。为适应世界产业的新发展,金融体制必然发生大改革。二是实体经济的新发展。金融危机过后,必然会再次探索产业核心技术突破方向,寻求实体经济发展前景。三是能源战略的大抉择。以石油、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石化能源时代,终将会走到尽头,世界经济面临着今后用什么能源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世界经济发生以上三大领域的调整,全球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①国家协作和干预作用会明显增强,以解决能源、环保、气候变暖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②市场竞争和贸易规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加入一些非传统的规则,出现“更公平”的竞争和贸易规则。③资源和全球环境问题,会成为影响竞争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④金融制度将发生重大变革,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将形成新的服务关系。⑤金融危机后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会出现新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经济会加速发展,并且由于网络的全球性和高度开放性,面临着新的竞争规则和新的商业模式挑战。

面对世界产业竞争格局和竞争规则的剧烈变化,金碚研究员认为,中国应该解决五个关键问题,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一是推进节能、省耗技术创新,提高新能源、新材料生产收益率,改造资源密集型产业。二是重点推进产业内工艺升级、产业价值链升级、产品质量升级,发展主导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进自主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拓展投资领域和内容,增强公众投资信心。四是寻找和开发新的成本竞争优势,继续保持成本控制优势。五是发展全球性的商贸流通网络,增强国内外市场渗透力和拓展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博士,提交了“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基于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扩张,并没有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经济威胁,而是在贸易结构、储蓄投资、技术进步等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①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农产品、能源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需求,缩小了世界贸易价格剪刀差,改善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②中国产业的高效率和廉价产品,抑制了物价上涨,增加了世界国家福利。③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储蓄和高人口红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投资和增长。④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提高了世界经济的边际生产率,降低了技术研发边际成本。中国产业与世界产业发展已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徐宏玲博士,提交了“企业控制力运行和全球生产网络本地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她指出,企业控制力是在开放条件下,企业通过控制力的实现,决定产品的定价、标

准和品牌权,控制财富流量的行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控制力”是对网络内外各种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机制。控制力转移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必然过程。全球生产网络进一步使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企业资源配置职能合理化。

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刘林青博士,提交了“二维治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的研究成果,指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政府和企业成为价值链治理的两个主要行动者。根据政府和企业参与治理的手段和路径、广度和深度不同,可出现市场治理、产业治理、公共治理、共同治理、网络治理等五种治理模式。在不同治理模式下产业国际竞争力会呈现不同效应。不同市场性质的产业适合不同的治理模式。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懋博士,提交了“生产理论演进与基本分析框架”问题的研究成果。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转变过程中,产业组织理论研究重点也由生产理论转向市场理论,这一变化导致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不足和局限。为此,金懋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研究了运输生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于“存量和流量、节奏和速度、控制和使用”三项权利安排为内容的生产过程分析框架。

## 二、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平研究员,就“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环境”问题做了主题报告。李平研究员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生产运行状况、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生产状况、产业经济各行业增速变动情况。他认为,尽管此次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但影响已经弱化,中国经济已开始触底回升。

李平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先于美国见底回升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调控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量急剧下降,消费品、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急剧下跌,公众信心指数严重滑落。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政府不失时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经济调控措施,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产业振兴计划、家电下乡等扩大内需举措,抵御住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加快了投资增长速度,带动了经济回升。使中国成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受影响较小、经济最先回升的国家。

在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时,李平研究员指出,我国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危险。主要因素有:金融危机对价格的影响衰减,调控政策对价格的影响,供求状况出现反转信号,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的影响,食品价格有上涨的压力,信贷规模过大的通胀风险等。李平研究员判断:价格水平会在第三季度转涨,但涨幅不会很高,同比涨幅转正可能在年末或2010年一季度。2010年若调控不当,通货膨胀会超出适度水平,但是,不会影响经济回升增长。因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原油和初级产品价格难以持续大幅上涨,政府调价因素是可控的,美元贬值可以被抵消。

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前景时,李平研究员认为,尽管现阶段中国经济回升主要依靠政府经济调控政策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回升的延续、价格水平的止跌转涨,公众信心会逐渐恢复,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会逐渐增强。这种趋势和前景已经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包括民间投资增长动力增强,存货增加开始成为经济上行的新动力,房地产市场升温,汽车市场也开始回暖。

在分析政府采取的经济微调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把握时,李平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在增强,经济回升态势强劲,价格水平止跌转涨,外部环境影响趋弱,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有明显好转。政府经济微调的目的是控制通胀和财政赤字,在一定范围内防止经济回升过快出现负面影响,并不是改变调控政策的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变,政策调整不会妨碍经济回升,而只会使经济回升更加健康。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刘志阳博士,从区域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建立了政府利润最大化模型,实证了我国总部经济过度竞争问题。他指出,城市基于总部经济发展的税收减免、财政补

贴、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总部经济收益存在倒U型变化关系。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存在一个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值,超过这个合理值,城市总部经济收益由增变减,会出现过度竞争。为了规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过度竞争,刘志阳博士提出,应重视城市软环境和条件的建设,增强城市相对优势,错位、联动发展总部经济;应重视市场的空间资源配置作用,整合区域资源增强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走市场主导发展城市总部经济的道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申明浩博士,提交了“高科技创业环境对区域发展困境的破解”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中国经济转型地区经历了寻租式创业的高速发展以后,渐渐滑入低水平重复模仿创新困境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恶性循环迹象。他指出,这些经济转型地区过度重视风险资本的项目投资、设施建设等硬件因素,忽视了技术创新源、创新集成交流平台、创新市场服务网络等高科技创业软环境建设,导致高科技创业精神未能有机融入地区文化意识形态中,从而形成区域发展恶性循环困境。据此,他认为,应加强高科技创新软环境建设,构筑以创业主体为核心的创新交流、集成和价值交换平台,嵌入区域发展循环系统,破解区域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困境。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陈文华博士,提交了“集聚、溢出与地区经济空间演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地区效应。时间演化上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先趋同后趋异再趋同的趋势,并表现出两俱乐部趋同。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且收敛速度先减缓后加速。空间演化上经济集聚和省域差距相伴出现,增长过程中区域外溢显著存在,促进了经济的趋同演化。他认为,我国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经济发展战略行动,成果显著,成功平衡了省域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今后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省域经济差距动态变化,加强省域合作互助,通过空间的集聚性和外溢性,实现区域间经济平衡快速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沈红波博士,提交了“债务来源、债务期限结构与现金流过度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他提出:①债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债务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作用。②不同债务来源对企业现金流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不同,商业信用由于存在再融资约束,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借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属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缺乏约束作用。③短期债务相对于长期债务具有更高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约束力。据此,沈红波博士认为,应该完善银行信贷机制,调整信贷结构,强化企业的投资风险和信贷责任意识,控制金融风险。

### 三、产业制度创新与中国产业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院长王俊豪教授,就“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问题做了主题报告。王俊豪教授指出,垄断行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服务性的产业,在大家积极研究如何治愈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创伤的时候,讨论中国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深化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经营效益,增加社会福利。同时还可以扩大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化解产业内在矛盾和支持中国经济回升。

王俊豪教授在介绍了垄断行业的属性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垄断行业传统管理体制的特征、缺陷和问题。①管理体制政企合一,企业经营主体地位不明确,经营管理效率低。②国有企业垄断生产经营,行政垄断特征明显,缺少成本压力和利润内在动力,企业经济效益低。③投资渠道单一供给不足,产品供需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福利水平低。④垄断经营缺乏有效价格竞争机制,企业内在经营创新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低。

基于我国垄断行业管理体制的缺陷和问题,王俊豪教授认为,促进竞争和民营化是深化我国垄断行业改革的两大主题。为此,必须对垄断行业进行市场结构重组,即适度分隔公共垄断行业的横向和纵向市场,放松垄断行业经营管制,放开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允许新企业进入经营垄断行业

业务。垄断行业市场结构重组,可以缩小企业过大规模,增强企业运行敏捷性和市场适应性;可以创造竞争空间,促进企业竞争,提高经营效率;可以剥离出可竞争的市场空间,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公共服务产品供给。

那么,如何实现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呢?王俊豪教授提出了六条民营化改革的基本途径:①发展垄断行业资本市场,运用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平台,吸引社会公众和民营企业投资和经营垄断行业业务。②出让、出租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权,保证最有实力和能力的企业经营公共垄断业务。③引入BOT项目建设经营机制,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和经营垄断行业业务。④吸纳民营企业投资入股,参与垄断行业业务经营。⑤开放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吸引民营企业独资经营。⑥通过产权转让、参股、控股等方式,出让、出售垄断企业竞争性辅业业务,实现主辅业务经营分离。

王俊豪教授指出,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实力不断增强,投资和经营垄断行业生产业务意愿强烈,我国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时机已经成熟。我国应该放松垄断行业管制,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直接经营管理职能,增加市场监管职能,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推进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促进我国垄断行业发展和市场绩效提高。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陈林博士,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企业创新竞争和产业演化模型,从中国产业竞争力角度研究了企业创新和产业垄断内生问题。他指出,内生垄断是企业创新竞争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市场机制和产业长期演化的必然产物。内生垄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内生垄断与社会总福利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是社会福利的合意结果。政府外生促进市场垄断,将损害社会福利;政府外生促进市场竞争,将损害国家长期科技创新能力;政府无法通过干预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据此,陈林博士认为,是内生垄断或是外生垄断,是判断企业是“合法垄断”还是“非法垄断”的基本原则。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吴绪亮博士,基于双边垄断市场,建立了双侧垄断模型和单侧垄断模型,研究了双侧垄断和单侧垄断竞争格局下零售商买方垄断势力增强的不同社会福利效果。指出从消费者福利角度考虑,双侧垄断条件下,纵向一体化效果优于纵向分离效果;单侧垄断条件下,纵向分离效果优于纵向一体化效果。据此,吴绪亮博士认为,单侧垄断的纵向市场结构,可以有效克服双重加价问题,买方抗衡势力假说是成立的。国家反垄断立法应该区分不同垄断市场结构,采取不同的反垄断政策。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汤吉军博士,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产业产能过剩导致的沉淀成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了沉淀成本和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沉淀成本,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造成资源错配和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汤吉军博士认为,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要实现产业管制,避免盲目扩张;加强产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发展完善生产要素二级市场,转化和消化沉淀成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朱海燕博士,从造就显著绩效差异的网络结构入手,构建了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的网络结构三要素优化模型,研究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优化问题。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产业集群网络,会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网络凝聚性显著上升、网络中介性降低,从而会增强产业集群的网络效应和产业竞争力。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帅萍博士,提交了“基于不完全契约模型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投资机理及对策分析”的研究成果。她指出,基于专用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产出价值,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的专用投资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稳定性及产出价值有关。外包情况下,为获取专业分工和生产匹配效率,上下游企业都会进行社会责任专用投资。在供应链社会责任产出价值不稳定的情况下,会促进下游企业社会责任专用投资或纵向一体化行为。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白让让博士,提交了“部分所有权安排与跨国公司纵向势力圈定效应”问题

的研究成果。他构建了一个产品差异化竞争下的纵向约束模型,分析了中国轿车产业持有部分所有权与跨国公司纵向控制行为关系,发现跨国公司存在投入歧视行为,特别是诱导中方参与者自主研发“滞后”的结构控制行为。通过产业和企业层面定位案例分析,进一步发现,中国轿车产业“后WTO”时期,跨国公司通过其纵向控制不断增强的能力,挤压本土品牌,弱化大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效应。据此,白让让博士提出,我国应该实施不对称的激励政策,触发大型国有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摆脱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

#### 四、产业发展微观机制与企业转型升级

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孙伯良教授,以浙江省为例,就地方企业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做了主体报告。孙伯良教授分析了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浙江产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浙江产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包括产业销售增长和利润减少的矛盾、产品质量品牌竞争和产品成本竞争之间的矛盾、制造大省和流通附加小省的矛盾、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矛盾、低水平扩张就业增长和高级知识人才隐性失业的矛盾。孙伯良教授指出,浙江省如果继续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走拼资源、拼劳力、拼价格的低层次产业发展道路,将面临着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失去利润、质量竞争失去市场、产业竞争失去人才的严峻威胁和挑战,浙江省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那么,浙江省应该如何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呢?孙伯良教授指出,一是要扩大产业能级:①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筑信息化产业平台,改进生产流程,优化管理系统,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增强人力资本作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劳动低成本优势向劳动高效率优势竞争转型,走出拼劳力不可持续产业发展之路。②吸收现代高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发展节能、环保生产技术,降低物耗,实现粗放成本优势向集约成本优势竞争转型,走出拼资源不可持续产业发展之路。③开拓研发平台,走自主创新之路,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流通服务业,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价格优势向质量品牌优势竞争转型,走出拼价格不可持续产业发展之路。二是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①产品生产领域,要逐步建立国际化的产品研发平台,吸纳国内外各种科技资源和人才,推进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开发含有核心技术的新产品,拓展产业幅度。②市场流通领域,要利用信息网络化平台,组织各类物流要素,建立点(会展)、线(物流线)、面(销售和服务客户)相结合的市场流通网络,渗透和融入全球市场流通网络,把握流通渠道,增加产品流通附加值和市场渗透力、拓展力。③产业链整合领域,要加强产业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培育,集成浙江省众多小企业和小产品,由零配件生产向部件生产、组装生产发展,发展大型组装企业,获取产业中心竞争地位。

关于浙江省应该如何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孙伯良教授认为,要坚持五个观念,提升五大力量:①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本观,加强企业的人力资本建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人才平台上获取经营能力优势、管理能力优势、研发能力优势、市场能力优势,提高企业经营竞争力。②要坚持“品牌化”的标准观,逐步实行规范化运作、标准化生产,与国际标准接轨,树立产品品牌,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③要坚持“集群生产”的一体观,推进大中小企业集群合作,提高企业的产业网络竞争力。④要坚持“产业转移”的破立观,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吸收国内外先进产业新技术,嫁接和改造本地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高产业技术竞争力。⑤要坚持“国际化”的全球观,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实现产品生产由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生产,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李眺博士,利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数据,研究了“产业专用性及其激励”问题。她提出,中国审计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的产业专用性行为不普遍。具有行业专家才能的行业领导者投资产业专用性,可实现产品差异化,收取较高的审计费溢价。非行业领导者的事务所投资产业专用性,可获得规模经济,将成本节约与客户分享,可提高市场占有率。会计师事务所产业专用性投资行为取向,受会计师事务所不同的市场策略影响。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潘松挺博士,从社会网络、技术创新、组织学习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了网

络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关系,指出网络关系强度对技术创新模式和绩效有直接决定性影响:集群网络关系强度与突破性技术创新呈负相关,与渐进式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弱网络关系会增强企业探索性学习和突破性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新技术和进入产品新市场;强网络关系会增强企业利用式学习和渐进式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新资源和扩大市场份额。据此,他认为,企业应根据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引进消化创新等不同创新目标,架构和配置创新网络关系强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胡川博士,提交了“高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与经营绩效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他指出,高校无形资产可分为技术类无形资产、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和商誉类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与高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都呈现正相关关系,特别是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更大。高校上市公司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创新高校与高校上市公司的合作机制,可以提高高校上市公司技术转化和产业化方面的作用。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孙继伟博士,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了转轨经济中软件园开发企业如何有效开发的问题。他指出,政商关系、主业与定位、土地性质与房产用途、软件产业与房地产双重时机、资金筹集与运用等五个因素,是软件园开发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商关系不仅是政府主导型软件园开发企业的首要成功因素,也是官助民办型和企业主主导型的首要成功因素。一要培育自身的系统能力、市场能力、机会能力等多重复合核心能力;二要根据软件园开发所处阶段调整策略重点,启动阶段要依托政府资源发展,成长阶段要明确园区特色,成熟阶段要优化商业模式。

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黄中伟博士,从国际合资企业的嵌入性网络出发,分析了组织间依赖关系质量对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演化的决定机理,并构建演化模型全面剖析了组织间依赖关系质量与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演化的动态关系。他指出,国际合资企业的稳定与否取决于合资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质量高低。在国际合资企业演化过程中,宏观协同演化内部或微观协同演化内部的不同步都会影响组织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质量,进而导致了国际合资企业的不稳定。对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的防范应从合资之初做起,并贯彻于合资全过程。

南京审计学院会计学院董必荣博士,提交了“不同资产的计量模式差异分析”的研究成果。认为有形资产通常采用单维财务计量模式,无形资产计量与有形资产计量应该不同,应采用多维综合计量模式。无形资产计量模式设计,要重点考虑无形资产在实现企业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作用机理。据此,他提出了以计分卡方法为主,财务计价和财务估价方法为辅的无形资产计量模式。

南京审计学院管理学院李昆博士,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结合案例分析、模型构建与推导,剖析N型、S型两类典型知识建构路径及其机理。他指出,不确定性及其引致的风险是管理情境的常态,N型与S型知识形成路径在经营实践中对应着不同的企业战略原型,二者综合、交互地呈现在企业组织的知识建构过程中。S型知识生成路径,属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非线性、非累积的知识建构模式,对于复杂情境具有主动吸收特征。应对现实复杂情境的企业创新,具有“创造性破坏”作用的S型知识生成模式起着决定作用。N型知识获得路径,能够凭借对已有知识库存或经验的搜索、回顾、借鉴,来规避当前的种种不确定性,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预期的主观感受,但容易丧失利用风险获得创新效应的可能机会。企业组织为了有效决策和技术选择,必须通过“复杂性降阶”行为来获得用于协调组织行为的显性知识。恰到好处的“复杂性降阶”,既能以组织可以接受的成本进行清晰编码,从而形成协调组织一致性活动的显性知识;又可以充分、主动地吸收复杂性以获得创新与发展机会。

会议分组交流期间,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结合会议交流成果和观点,就产业组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和建议。在产业组织理论和方法方面,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黄中伟博士指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其“组织性及组织效应性”。产业组织的组织性包括市场的组织性、空间的组织性、生产的组织性。这些产业组织的组织属性,会产生相应的产业组织效应,如基于产业集聚的产业组织空间组织特征及竞争优势效应,基于企业竞合的产业组织市场

组织特征及资源配置效应,基于生产技术联系的产业组织生产组织特征及价值链效应等。因此,要增强产业组织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解释力,需要拓展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实现市场组织理论、生产组织理论和空间组织理论的有机统一,是提高产业组织理论生命力的关键。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郁培丽博士提出,产业组织演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产业组织研究不仅需关注现时的市场结构和绩效,更需关注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绩效。产业组织演进可能出现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既是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础,又是政府制定产业组织政策的焦点。产业组织未来合理市场结构和良好市场绩效,是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因此应创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重视产业组织的动态化和预期绩效研究。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杨永忠博士提出,厂商之间的产量博弈和价格博弈,是企业市场行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获取企业利润的重要组合手段。因此,产业组织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厂商产量决策、价格决策和产业市场绩效的内在联系和均衡关系。

在产业组织发展实践方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白让让博士提出,网络结构是产业组织固有的组织形态,网络结构含有基于亲缘地缘的社会关系、基于竞争合作的市场关系、基于外溢和学习的创新关系、基于分工和分化的价值链关系,产业组织研究应不仅要重视基于网络结构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关系问题,而且更要重视基于网络结构的产业组织演进、转型升级问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唐跃军博士提出,企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因此研究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要聚焦于由企业组成的产业组织,关注产业组织的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关注产业组织内部技术创新机制,关注产业组织外部技术创新效应。仅考虑政府、科研单位或创新个体的作用因素,会很难把握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唐要家博士指出,产业组织总绩效,除了基于资源配置效果的市场绩效外,还有基于市场容量规模和充分就业的产量绩效,基于产业组织技术联系和外部效应的创新绩效。因此,政府制定产业组织政策,要立足于产业组织的总绩效,同时考虑产业的组织市场绩效、产量绩效和创新绩效。

## **Reflecting on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n Basi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Review on Young Scholars' Academic Symposium of 2009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HUANG Zhong-wei, SUN Bo-liang, DONG Fu-hua

(Business Management Schoo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On the young scholars' academic symposium of 2009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revolving around topic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rroundings, industri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nd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micro-mechanics and firm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participants launched hot discussion. Their core points are followings: ① Although defe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is a reason resulting in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oot lies in obstac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② Because macro-economic have inclined from bottom,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become weaken, it is the time to push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③ For Chinese economy having deep influence on the dire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take part in global economy repairing actively and form positive competing configuration; ④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re the ke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⑤ Industrial micro-mechanism and firm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the ground of countermeasures repairing economic structure destroyed by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firm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责任编辑:高粮]